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研究生姓名： 牛媛媛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王庆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 财政学

研究方向： 财政理论与政策

提交日期： 2022年5月28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牛媛媛 签字日期： 2022.5.31

导师签名： 王 签字日期： 2022.5.31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牛媛媛 签字日期： 2022.5.31

导师签名： 王 签字日期： 2022.5.31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flow und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Candidate: NIU Yuan-yuan

Supervisor: WANG Qing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财政分权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在这一制度作用下,受经济和晋升激励的影响,会偏向于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七普数据显示出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庞大,必然会对地方财政支出产生影响。财政分权下的经济激励也使得地区间发展存在差距,引起人口流动,从而影响地方财政支出。所以本文将考虑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内容有: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理论现实意义、相关的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方法、亮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首先对财政分权、人口流动和地方财政支出进行了概念界定,然后从财政分权理论、人口流动理论和财政支出增长模型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分析了财政分权、人口流动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发展情况,并研究了财政分权、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作用机理,以及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作用机理。第四部分为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通过变量选取和模型介绍,按照全国、人口流入地、人口流出地分别进行分析。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政策建议,通过之前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检验结果,得出一些结论并且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财政支出分权在三种层面下都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呈现正相关性关系,并且对人均生产型支出的影响系数均大于人均消费型的系数。第二,在全国层面,人口流动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生产型支出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人均消费型支出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人口流入地层面,人口流入除了对人均维持型支出不显著外,其余都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人口流出地层面,人口流出对人均维持型、人均生产型支出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人口流入地相较于人口流出地财政支出能够更好地与人口流动相匹配。第三,财政支出规模相对合理,支出结构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明确央地责任,完善考核制度;第二,完善人口流动的制度机制;第三,维持支出规模正增长,引导支出结构合理。

关键词: 财政支出分权 人口流动 财政支出规模 财政支出结构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made tremendous success, and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gim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However, under the role of this system, local governments will be affected by economic and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will fav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affect the structure of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The Data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shows that the scale of population flow in China is huge, which will also have an impact on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Economic incentives und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ve also led to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between regions, causing population movements, which affect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So this thesis considers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flow und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thesis is as follows: The first section is a prolegomenon, which describes the backdrop and theoretical realistic meaning, the relevant review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content and methodology, and the bright spot and deficiency. The next section is correlative notions and basic theories, which first shows the concep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pulation flow and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n 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thesis from the theory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pulation flow theory and fiscal expenditure growth model. The third section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pulation flow and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and studies the mechanis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flow on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flow und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The fourth section i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opulation flow und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which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whole country, population inflow and population outflow through variable selection and model introduction. The final section is the findings and policy advice of this thesis, through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test results, some findings are drawn and practic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he main findings drawn in this thesis are: First,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show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on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at three levels, and the coefficient of influence on per capita production expenditur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er capita consumption. Second, at the national level, population flow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 capita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and per capita production expenditure,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for per capita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t the level of population inflow, population inflow is not significant except for

per capita maintenance expenditure, the rest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at the population outflow level, population outflow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 capita maintenance and per capita production expenditure, indicating that the fiscal expenditure of the population inflow area can better match the population flow than the population outflow place. Third, the scal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s relatively reasonable, and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has certain irrationality.

Under these findings, some practical advice as follows: first,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of authorities, and refine the assessment system; seco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flow; third, maintain positive growth in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and guid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expenditure structure.

Key words: Fiscal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Population flow; Fiscal expenditure scal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2
1.2.1 财政分权的文献综述	2
1.2.2 人口流动的文献综述	4
1.2.3 文献述评	6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7
1.3.1 研究内容	7
1.3.2 研究方法	8
1.4 亮点与不足	9
1.4.1 亮点	9
1.4.2 不足	9
2 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10
2.1 相关概念	10
2.1.1 财政分权	10
2.1.2 人口流动	10
2.1.3 地方财政支出	11
2.2 基本理论	12
2.2.1 财政分权理论	12
2.2.2 人口流动理论	13
2.2.3 财政支出增长模型	13
3 现状分析及作用机理分析	15
3.1 现状分析	15

3.1.1 财政分权	15
3.1.2 人口流动	17
3.1.3 地方财政支出	19
3.2 作用机理分析	21
3.2.1 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支出的作用机理分析	21
3.2.2 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作用机理分析	22
3.2.3 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作用机理分析	24
4 实证检验及分析	25
4.1 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和处理	25
4.1.1 变量选择	25
4.1.2 数据来源和处理	28
4.2 模型介绍及设定	29
4.2.1 模型介绍	29
4.2.2 模型设定	29
4.3 实证检验	30
4.3.1 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30
4.3.2 基本回归分析	31
4.3.3 稳健性检验	34
4.4 分流入地流出地分析	35
4.4.1 人口流入地	35
4.4.2 人口流出地	38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5.1 结论	41
5.2 政策建议	42
5.2.1 明确央地责任，完善考核制度	42
5.2.2 完善人口流动的制度机制	43
5.2.3 维持支出规模正增长，引导支出结构合理	44

参考文献	45
后 记	5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分权体制对此发挥了重要的制度作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政制度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地方政府进行供给的能力。具体来说，收入方面的话，地方政府大多依据中央政府规定范围的税种、税率进行税收征管，只有一小部分税种可以依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征收，还限制了税率范围等内容；而支出方面的话，地方政府支出大多数存在刚性，所以往往会形成支出大于收入的局面。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可能的完成基本指标和获得政治晋升，会趋向于供给短期内能够有效果的支出类型，如道路等基础设施，从而会挤压其他类型的支出，使得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性，因此讨论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人口问题对我们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存在着许多人口问题。根据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得出我国人口目前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人口流动活跃。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流动人口达到3.76亿，这么多的人口进行流动必然会对经济社会各方各面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也会给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带来很大变化。从人口流入地角度分析，大量的人口流动会增加劳动力数量，也会增加当地消费，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地方活力；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需求意识增强以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流动成为趋势，人们会对教育、医疗、卫生等有更高的需求，从而会使得财政支出增加，但是户籍制度也使得流入地政府会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不同的供给水平。人口流出地则是不同的影响，大量人口外流减少了当地消费活力和发展潜力，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另外财政支出还是依据户籍人口进行提供，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资源浪费。所以地方政府应该依据人口的实际情况进行财政支出的调整，以实现财政支出的合理配置。

综上所述,人口流动会从流入地和流出地两方面对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产生不同的影响,流动人口与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会对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在财政分权制度下,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经济激励作用下会偏向于基础设施等投入,同时也会使得地区差距扩大,引起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政治晋升的作用下,也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尽可能少地进行支出,从而借助户籍管理制度区分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而使得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出现非均等化问题。因此,在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会对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产生何种影响是本文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来讨论我国财政分权和人口流动共同作用下对地方财政支出产生的影响。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本文探讨在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目前引入财政分权来分析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文献较少,并且大部分学者都是针对教育、医疗、社保等具体支出进行具体分析,进行整体分析的较少,本文引入维持型、生产型、消费型财政支出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的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性。本文除了从全国层面进行分析,还分为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比对从而得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2) 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 2009-2019 年我国 31 个省的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为地方财政支出提供有效的执行依据,根据人口流动情况相应地调整财政支出,形成合理的人口流动模式,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从而形成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整体社会持续健康规范化发展。

1.2 文献综述

1.2.1 财政分权的文献综述

(1)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李光龙和梅婷婷(2021)等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角度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强等(2021)也指出财政分权长期内会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庞瑞芝等(2021)提出财政分权能够推动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黄裕洪(2021)和陈凯等(2021)认为地方政府能够通过税收优惠和政策补贴等激励手段刺激地方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谢国根等(2021)还提出这会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步。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另一种观念,认为财政分权引起的政府之间竞争会拉大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造成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Prud'homme(1994)根据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进行权力下放得出,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具备完善的发展条件,吸引力较大,而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吸引力较小,从而会造成两极分化的现象,使得地区间发展更加不均衡。Christian和Lessmann(2009)依据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情况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认为发达国家各项制度更加健全,政策支持会最大限度地给予到真正需要的贫困地区,使得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而在欠发达国家,制度和监督机制都不够完善,权力的下放会加剧地方政府的剥削行为,进一步拉大地区间发展的差距。

(2) 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分权通过下放部分财权和事权会使得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拥有收支自主权,能够更大程度上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偏好,从而提高地方财政支出的供给效率,部分学者也支持这一观念。Zhuravskaya(2000)和Faguet(2004)通过对不同的国家进行研究得出,财政分权会增加政府对教育、卫生方面的支出力度,Faguet(2004)还指出会增加对污水处理的供给。

而大部分学者普遍得出的结论与上述不同,认为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热衷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会造成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Qian和Roland(1998)就从边际价值研究角度支持了这一结论。Keen和Marchand(1997)在设定劳动力不能流动而资本能够流动的前提条件下,得出与当地居民紧密相关的支出一定是不足的,而基础设施等的生产型支出并不一定是不足的,从是否一定不足这一角度分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上会出现偏差。Mauro(1998)通过对比不同支出收受贿赂的困难程度,发现一些受贿部门会选择在基础设施上投入更多,从而产

生寻租行为。Bucovetsky (2005) 认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会加大对要素的吸引力；同时将更多的地区纳入考虑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地区也都热衷于投资基础设施，表明这一投资倾向较为普遍。平新乔等 (2006) 指出这一体制下的制度激励会影响政府预算内、外支出的模式，其中预算外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上面，用来进行招商引资。任志成等 (2015) 指出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依靠制造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而制造业对于基础设施的要求又较为严格，所以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会想方设法地改善基础设施，从而增加对制造业的吸引力。刘冰玉等 (2018) 通过研究也发现财政分权会降低地区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这种影响在中部地区表现得更加显著。

财政分权对教育的影响研究较为丰富，乔宝云等 (2005)、傅勇等 (2007)、郑磊 (2008)、傅勇 (2010) 都通过研究指出财政分权导致对教育支出显著不足，其中郑磊 (2008) 还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财政分权增加一单位，教育支出的比重下降就会超过一单位，傅勇 (2010) 还指出财政分权也会使得基础教育的质量显著下降。

1.2.2 人口流动的文献综述

(1) 影响人口流动的研究

许多学者都提出经济因素是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现实情况和理性人假说也容易理解。其中，威廉·配第是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具体是指如果两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有了较大的差距，人们就可能会向经济发展情况好的地区进行流动，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目标。W. A. Lewis (1954) 认为人们会从农业部门流动到工业部门的城市。Todaro (1969) 指出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现金流的预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Carlsen 等 (2009) 则具体指出居住环境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首要因素。王桂新等 (2012) 和高倩等 (2018) 通过研究人口流动中的吸引力，发现经济和收入对人口流动的吸引力明显增强，而空间距离的影响明显降低。

接着从财政因素影响人口流动进行分析，Tiebout (1956) 指出人们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税收负担的整体情况，自由地选择自己对这一整体情况都相对满意的地区进行生活，即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同时 Day (1992)、Bonin 等 (2000) 和 Borrow (2002) 等学者也都得出类似的

结论。Kallandranis 等(2014)也认为财政因素很重要,因为他通过研究发现这一因素会获得人们的信任,增强情感上的认同。雷小乔等(2017)通过实证表明人均财政负担关系到人口流动的变化情况。赵佳佳等(2018)得出财政支出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一个地区的支出增加不仅会增加当地的人口流入,也会增加周围区域的人口流入。

最后详细阐述具体的财政支出如教育支出等,会对人口流动产生怎样的影响。Cebula 等(2013)观察得到州立公园的数量与人口迁移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丽等(2011)、夏怡然等(2015)、何文举等(2018)和李海荣等(2021)通过不同方法得出地方政府的教育、医疗、社保这三者部分支出或者全部支出能够促进人口的流入,同时张丽等(2011)指出这三者对人口流入的作用要大于基础建设支出的作用,何文举等(2018)则指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农林水支出与人口流动具有负相关关系。

(2) 人口流动的影响的研究

1. 影响经济因素

Todaro(1969)指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具有经济收敛作用,会缩小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经济差距。Taylor 等(1997)和姚枝仲等(2003)都指出人口流动能够明显改善流动地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进而改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林毅夫等(2004)、袁晓玲等(2009)、侯燕飞等(2016)也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Ashby(2007)也得出从长期观察人口流动具备较高经济效益,能够提升整体的福利水平。

史桂芬等(2020)指出大规模人口进行流动会形成集聚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从而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整体布局。郑峥(2020)也认为人口流动会加快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其中人口流入比人口流出产生的效果更好。

Lewis(1954)、D W Jogenson(1967)和 Michacl P Todro(1969)等都提出了理论支撑,指出人口流入使得劳动力大量流入,形成劳动力红利,同时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能够推动产业升级。史桂芬等(2020)通过分析指出人口流动会改变人口分配的格局,积累人力资本,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2. 影响财政因素

杨文杰(2011)将人口研究和财政研究两者有机统一起来称为人口财政,有利

于人口和财政两者更好地发展。刘德军(2015)通过研究指出山东省的流动人口对山东省财政收入的贡献举足轻重。成喜玲等(2016)发现人口流动对地方支出规模的影响为正。

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地方财政支出存在资源不匹配的问题。付文林(2012)通过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公共品较为拥挤,而这些公共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即说明具有此特性的公共品存在着一定的消费壁垒。刘冰玉等(2018)、刘欢等(2018)和史梦昱(2020)都指出人口流动和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呈负相关关系。王金营等(2015)、刘冰玉等(2018)和刘欢等(2018)通过研究证明了地方政府是以户籍制度为标准来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项淼琴(201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人口流动与医疗、交通运输等的支出效率是负的相关性关系。关于人口流入地的研究较为丰富,付文林(2007)发现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型支出并未相应增加;江依妮(2013)也指出随着人口的流入,流入地的消费型支出水平有所降低;甘行琼等(2015)指出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也会下降;段哲哲等(2017)指出流入地享有的教育资源会减少。对于人口流出地方面来说,向祎(2018)指出随着人口的流出会减少税收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公共服务的支出水平;张月月(2018)认为人口流出主要会影响当地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

1.2.3 文献述评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关于财政分权和人口流动的相关文献比较丰富,但是大多数集中于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或者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同时考虑财政分权和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文献较为稀少。在整理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影响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在供给财政支出的时候存在着户籍歧视,而财政分权对户籍管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而财政分权体制下的经济激励可能会使得地方政府增加竞争,进而扩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引起人口流动,而在户籍管制的作用下,会产生流动人口地方公共品供给的非均等问题,所以把财政分权和人口流动放在一起进行考虑很有必要,可以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因此本文讨论在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分析,实证研究财政分

权下人口流动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的作用机制。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在财政分权的视角下，考虑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分析，并按照一定分类标准将地方财政支出划分为三部分，理论阐述具体的传导机制，并分别通过全国、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三个层面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维持型支出、人均生产型支出和人均消费型支出进行对比实证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框架图如图 1.1 所示，研究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先是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其次是文献综述，从财政分权和人口流动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通过对已有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发现了现有文献中的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并将此作为本文的研究角度；接着介绍了研究内容及方法；最后整理了本文的亮点与不足。

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首先分别介绍了财政分权、人口流动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概念，接着从财政分权理论、人口流动理论和财政支出增长模型详细描述了本文的基本理论。

第三部分为现状分析以及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如何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的传导机制阐述。首先介绍了当前财政分权、人口流动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发展情况，接着分析了财政分权、人口流动分别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及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的传导机制。

第四部分是实证部分。首先通过选取变量和介绍模型，确定本文用面板模型分析 2009-2019 年我国 31 个省的数据，接着通过检验，确定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得出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同时分为全国、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三个层面对四个被解释变量进行具体的对比分析，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原因解释。

最后为结论和建议部分。根据第四部分的实证结果整理了相关结论，并结合之前的理论基础和当下的社会现实情况，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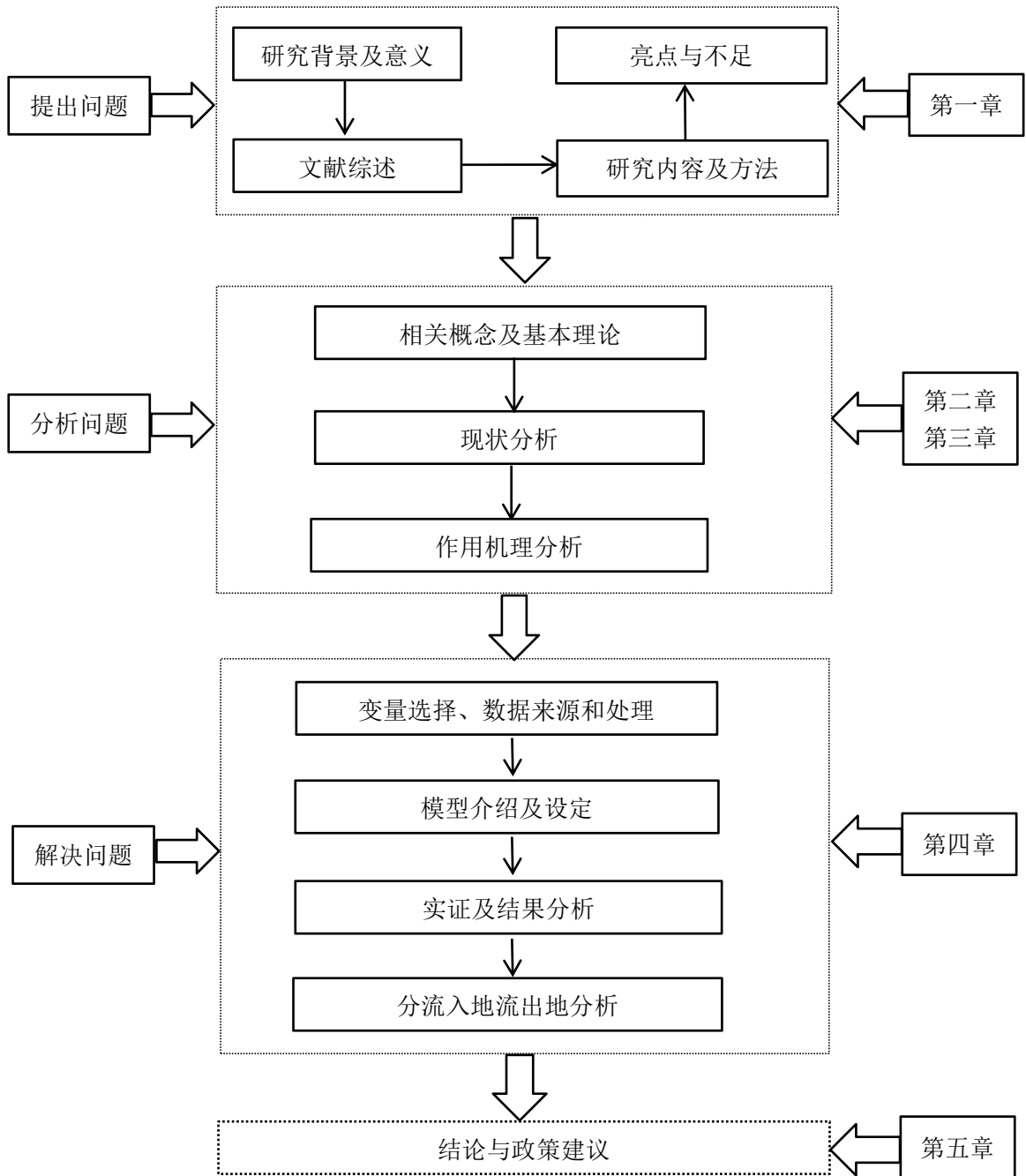


图1.1 本文的框架图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总结、定量分析、实证检验这三种方法来进行研究。文献总结为,通过对国内外书籍和期刊等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找到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归纳梳理出当前相关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及重要结论。定量分析为,通过一些图表直观地介绍我国中央、地方收支占比,人口流动规模,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

划分,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总量及占比等情况。实证检验为,通过搜集全国 31 个省的财政分权、人口流动和地方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接着进行回归分析,并且通过稳健性检进一步加强回归结果。其中还使用对比分析,从全国层面、人口流入地、人口流出地三个层面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四个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

1.4 亮点与不足

1.4.1 亮点

第一,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不管全国、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财政分权都对生产型财政支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给当前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实证支撑,能够更直观地展示出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加偏向于投资生产型支出。

第二,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全国、人口流入地、人口流出地的不同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层面的不同情况,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使得政策建议更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提出全国层面要引导支出的资源匹配;人口流入地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保持,并要进一步加强消费型支出的力度;人口流出地要摒弃大力投资生产型支出的思路,根据自身所处位置进行考量。

1.4.2 不足

第一,由于本人自身水平和能力有限,再加上寻找一些资源的困难,使得有些问题没有做出更加深入地研究,一些表述也较为不规范。

第二,本文在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采取了多数文献中的人口流动衡量办法,即用一个地区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作为一个地区当年的人口流动情况,数据虽然较为粗略,但是也可以反映出人口流动的基本情况。

第三,在变量的选用情况上,控制变量并不能够穷尽所有的对财政支出有影响的因素,这样可能会造成数据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偏差是在可控范围的。另外,实证检验也不是非常严谨,但是实证过程还是相对完整的。

2 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2.1 相关概念

2.1.1 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是指上级政府将一定的财政收入权利和财政支出责任向下级政府转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下级政府也拥有了一定的财政收支自主权,能够自主决定一定范畴内的预算支出规模以及支出结构,也可以被称为财政联邦主义。本文所指的财政分权是中央政府将收入权利和支出责任向地方政府转移的过程,从而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财政收支自主权,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管理目标。

国外一般认为财政分权是指政治和经济都分权,而我国指的是相对集中的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因此我国的财政分权具有独特性,需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

2.1.2 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也是本文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们受经济或者非经济因素影响在较长时间内改变居住地的社会行为,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人口流动是我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制下所形成的专有概念,国外一般没有人口流动的概念,相对应的概念为人口迁移。具体来说,人口流动只是居住地发生了一定时期的变化,户籍登记地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人口迁移指的是不仅居住地发生了改变,户籍登记地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成为迁入地户籍人口的一部分,是永久性质的迁移。同时相应地将发生这两种行为的人口分别称为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所以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是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所产生的结果,是人口学的概念。

人口流动和我国户籍制度密不可分,在户籍制度产生之初,流动人口数量较少,人口流动主要依靠政策引导,如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飞速,人口流动数量迅速增加,这一时期的户籍制度也有所放松,经济因素代替政策因素成为了影响人口流动最主要的因素,但是目前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和户籍

制度仍然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2.1.3 地方财政支出

地方财政支出是本文最后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其公共职能,对其拥有的财政收入进行规划和支配的过程,也是对公共产品进行供给的重要途径,能够满足公众的共同需求,同时也是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

财政支出的分析角度有很多,为了更为具体的分析本文关注的问题,将其按照可用于的经济用处进行分类,可以大致分成三部分,分别是维持型财政支出、生产型财政支出和消费型财政支出。其中,维持型财政支出是指政府正常运作所需要的管理成本,也能展现出政府运行和管理的效率问题,也能保障居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生产型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市场主体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所需要进行的支出,本文所指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多属于生产型财政支出;消费型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满足当地居民更好生活的需求而进行的财政支出。可以看出这三种支出所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也可以说,财政支出结构能够更加清楚地反映出政府的活动区域和发展方向,所以相对于财政支出规模可能会有更加直观的效果。

财政支出分类的标准在 2007 年发生了改变,由于本文主要研究 2009-2019 年的范围,都是在 2007 年以后,所以表 2.1 直接列出了改变后的分类科目。由表 2.1 可以看出,消费型财政支出包括的科目种类最多,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也最为密切,而且这一支出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需要特别注意这一支出是否根据人口的变动进行相对应的支出,进而满足人们的需要。

表 2.1 财政支出结构

	维持型财政支出	生产型财政支出	消费型财政支出
具体科目	地方一般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 城乡社会事务	农林水事务 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事务 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	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 环境保护

2.2 基本理论

2.2.1 财政分权理论

在现代财政学中，先后形成了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财政分权理论，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

上个世纪 50 年代，形成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哈耶克(Hayek) (1949)、蒂伯特(Tiebout) (1956)和奥茨(Oates) (1972)等经济学家都发挥了重要的贡献。哈耶克(Hayek) (1949)认为地方政府能够更近距离地接触当地居民，及时掌握当地居民的需求变化，从而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也从经济意义上说明了设立地方政府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所在。蒂伯特(Tiebout) (1956)提出了“用脚投票”，指出人们会根据财政因素进行迁移，而地方政府也会根据人们的迁移情况调整当地的服务水平和税收等情况。为了避免当地人口的外迁，当地政府会做出一定的政策调整，供应更优的公共服务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也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从而留住人口。奥茨(Oates) (1972)指出政府提供公共品具有最优边际，即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还通过对比指出如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提供同一种公共品的成本相等时，地方政府进行供给会更有效率。但是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整体上都假定政府官员是无私奉献的，显然这一假定是脱离了现实情况的。

上个世纪 80 年代，蒙蒂诺拉(Montinola)、钱颖一、温加斯特(Weingast)等学者针对第一代的假定进行了修改，提出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第二代指出政府官员自身也是理性人，做出决策时也是依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要制定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以及约束机制，让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和居民的福利大致保持相同，既激发官员积极性，又能维护居民利益。

第三代财政分权理论又进一步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补充说明，指出地方政府在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冲击时会导致政策偏差和政策扭曲，从而会影响财政分权带来的效果。所以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效率，降低财政分权产生负面影响的概率。

2.2.2 人口流动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流动人口才开始大规模出现,我国对人口流动的研究才随之增多,而国外有关研究开始较早,所以我国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是在国外研究基础上展开的。

赫博尔(Herberle)(1938)认为人口迁移现象是众多因素综合产生的结果,并由此得到推拉理论,其中迁出地的外推、迁入地的内拉以及个人的迁移能力和成本都发挥着尤为突出的作用。李(Lee)(1996)对此进一步进行了补充,引入了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困难因素,明确了相关因素会对人口迁移产生影响。

刘易斯(Lewis)(1954)提出了刘易斯模型,指出发展中国家通常由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两部门组成,也被称为二元经济理论。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劳动力,由于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递减,再加上农业部门就业存在季节性,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在农业部门无法满足生存需要。同时工业部门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多的工作机会,所以会吸引农业部门的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

蒂伯特(Tiebout)(1956)得出的理论不仅是财政分权理论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人口流动理论的重要组成,即人们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选择迁移到自身偏好的地区,这一理论给之后关于该问题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新迁移理论在综合考量人们迁移的投入成本和迁移所获得的收益情况这一前提条件下,把他们的个体、家庭特质和迁移行为放在一起考虑,其中引入家庭的因素由此将人口迁移的关注角度由独立的个人转变为相互依赖的个人,肯定了人的情感价值。

2.2.3 财政支出增长模型

阿道夫·瓦格纳(Adolf·Wagner)提出了政府活动扩张法则,也是“瓦格纳法则”。具体的内容是指随着国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升,财政支出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增长。对于这一现象,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虑:一是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大量的人口集中在了城市,为了维护社会和经济正常秩序必然会提高政府管理的成本;二是政府自身指导经济也会扩大财政支出;三是随着

社会的发展对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公共产品需求也会进一步增加，这就要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

皮考克(Peacock)和卫斯曼(Jaok Wiseman)在瓦格纳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英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实际财政支出的数据，发现财政支出是按照“阶梯式”的形状进行增长的，被称作梯度增长理论。如图 2.1 所示，和平时期的政府全部支出和政府民用支出都是呈现线性增长的上升趋势，这是因为民众心中存在着一个可以接受的纳税水平，并且政府全部支出的最高值也受到这一水平的制约。但是在战争时期，民众可以接受的纳税水平有所提升，就出现图 2.1 中政府全部支出阶梯性的增长，同时这一时期战争支出会大幅增加，挤压了政府民用支出，造成了政府民用支出规模大幅度减少。而在战后和平时期民众可以接受的纳税水平并没有随之下降，所以政府全部支出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仍处于较高的位置上，使得政府全部支出高于战争前和平时期的水平。同时这一时期，战争支出减少，政府民用支出也获得了阶梯性的增长，也高于战争前和平时期的水平。这都说明在经历了战争等突发事件后，政府全部支出和政府民用支出的支出水平都会高于原先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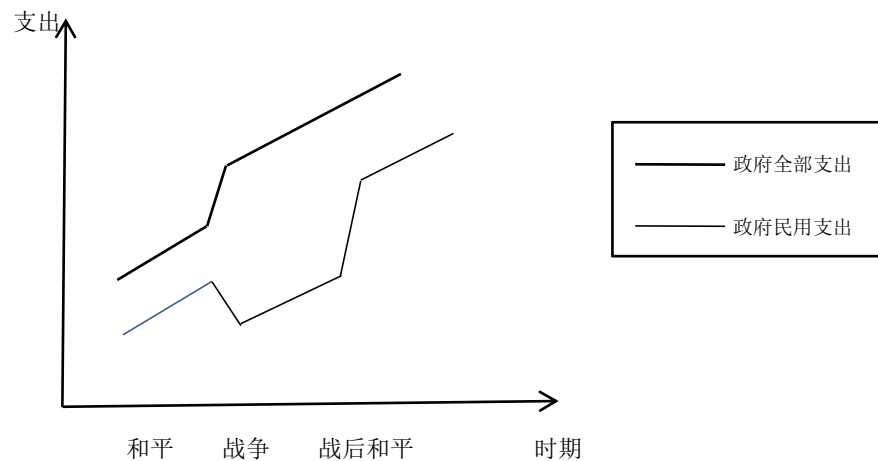


图 2.1 梯度增长理论图

官僚行为增长论主要讨论的是政府官员的行为对于支出的作用。依据理性人假说，政府官员依然会保障自身利益，获取更多的权利。一般认为政府机构的规模越大，政府官员的权利也就越大，所以他们通常会追求政府机构规模最大，机构规模越大日常需要的管理费用也会增加，这就会导致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增长。

综上所述，财政支出由于各种因素会大致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3 现状分析及作用机理分析

3.1 现状分析

3.1.1 财政分权

我国财政体制从建国到目前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根据集权程度的大小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建国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集权程度最高,中央政府拥有绝大部分的管理权利,财政收入和支出也都由中央政府严格管理,完全意义上执行着“收支两条线”。虽然在此期间也尝试了一系列的体制调整,但始终没有动摇“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一属性。

二是改革开放后到分税制前,这一时期进行分级包干管理机制,产生了分权的萌芽。这一机制运行时间最短,承担着过渡性质的作用,但是依然取得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具体是指,通过适当下放财权,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主体,更加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经济建设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伴随着权力的下放,中央调控经济的能力被大幅度削弱,使得财政领域常用的“两个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在1993年达到低点,分别为图3.1中所示的12.19%、22%。

三是分税制改革到目前,这一时期称为分税制体制。为解决中央调控经济能力被削弱这一问题,我国在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主要指的是以下三点:第一,依据税种的归属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第二,依据事权和支出责任恰当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归类;第三,制定了税收返还以及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由图3.1可以看出,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迅速得到提高,并且以后年份也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这表明这一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了中央财政收入逐步增长的分配制度,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也使得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理化。

下面通过图3.1和图3.2直观展示出建国之后有数据记录的年份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占比的变化情况,同时图3.1还展示了同一时期全国财政收入/GDP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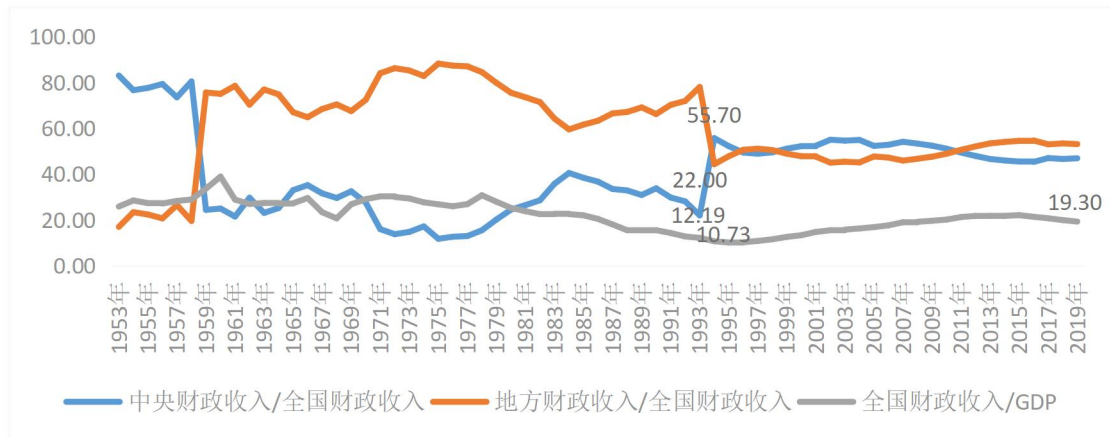


图 3.1 1953-2019 年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和全国财政收入/GDP 的变化情况

从图 3.1 可以看出，1953-1958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在 80% 左右，而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仅在 20% 左右，远小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说明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基本都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1958 年为了给予地方政府一些权力，实行总额分成，在 1959-1978 年，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平均为 77.34%，远大于同时期中央财政收入占比的平均数 22.66%，说明这一时期扩大了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1980 年实行分级包干体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均高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扩大了地方财权，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使得地方政府有了发展地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激励性，但是也导致中央财政负担过重。1994 年分税制实行后，全国财政收入占比呈现出缓慢增加的态势，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明显得到了提高，在此之后的中央、地方收入占比均在 50% 上下进行波动，没有再次出现之前的远超现象，较为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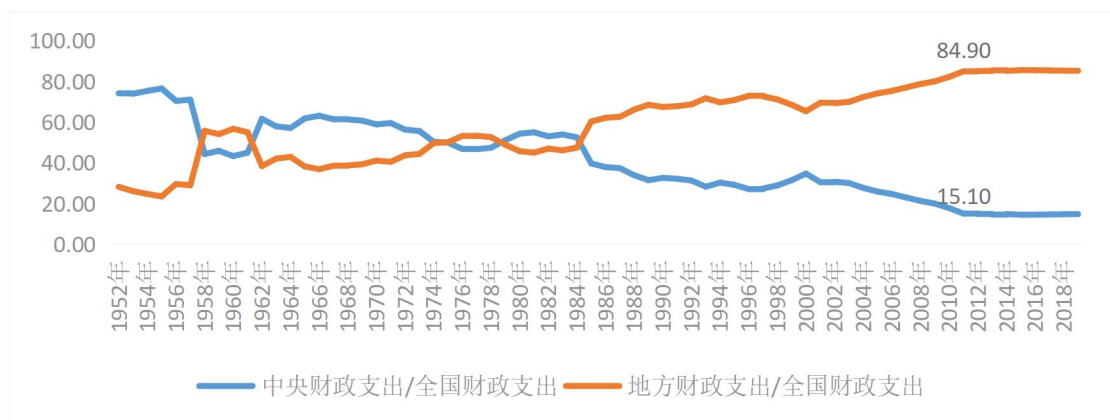


图 3.2 1952-2019 年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的变化情况

从图 3.2 可知, 1952-1957 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均大于 70%, 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均大于 20%, 接近 30%, 说明财政管理权限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1958-1961 年许多中央企业的管理权限被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 地方政府拥有了管理责任, 使得这几年间的地方支出占比高于中央。1962-1984 年, 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的差值除过在 1975-1978 年间为负数, 其余都是正值, 且正值的数值绝大多数都大于负数的绝对值。1985 年后, 中央和地方支出占比相较 1962-1984 年的整体情况呈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 地方支出占比急剧上升, 中央支出占比急剧下降, 甚至在 2010-2019 年中央这一数值均不到 20%, 近年来甚至均在 15% 以下。由图 3.2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2011 年后, 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在 15% 左右, 保持在较低水平线上, 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保持在 85% 的水平上, 保持在较高水平线上。结合图 3.1 可以看出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大致保持在 50% 左右, 因此可以得出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现象较为严重。

3.1.2 人口流动



图 3.3 2009-2019 年的人口流动情况

图 3.3 描述了我国 2009-2019 年全国人口流动的情况, 由此可知流动情况呈现出先快速增加后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2014 年作为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由 2.11 亿增长到了 2.53 亿, 之后开始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但还是在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仍然占到全国总人口 17% 左右的比重。可以用推拉理论分析近年来的缓慢下降趋势, 一是推力因素, 受户籍制度的限制, 外来流动人口无法长期定居在流入地, 加上家庭流动的因素, 孩子接受教育等问题致使流动人口回流; 二是拉力因素, 随着政府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和优惠政策的不断落实, 乡村振兴的不

断推进，流出地生活、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些都强烈吸引着人口的回流。

在全国流动人口有所下降的同时，省际流动人口呈现不断增加趋势。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为4242万，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为8588万，2013年为9297万，2014年约为9433万，2015年为9691万人，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的结果是1.25亿人，可以看出第五次普查到第六次这十年间省际流动人口增长了一倍多点，而第六次普查到第七次这十年间省际流动人口增长了不到50%，这说明省际间流动人口的增长幅度呈现出下行的态势。

2017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户规模为2.70人，其中三人及以上的户数占比达到了56.6%，超过流动人口的一半以上，表明流动人口整体上呈现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流动的趋势，这也体现出了新迁移理论中的家庭特质。

一般称1980及以后出生的人口为新生代人口，2017年新生代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比重为65.1%，较2015年的62.3%略有上升，说明其构成了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的话，2017年中流动人口这一数值为9.6年，新生代这一数值为10.2年，说明新生代受教育年限较长。另外，新生代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的意愿也较为强烈，也愿意在该地长久生活，有结果显示有42.2%的流动人口愿意落户流入地。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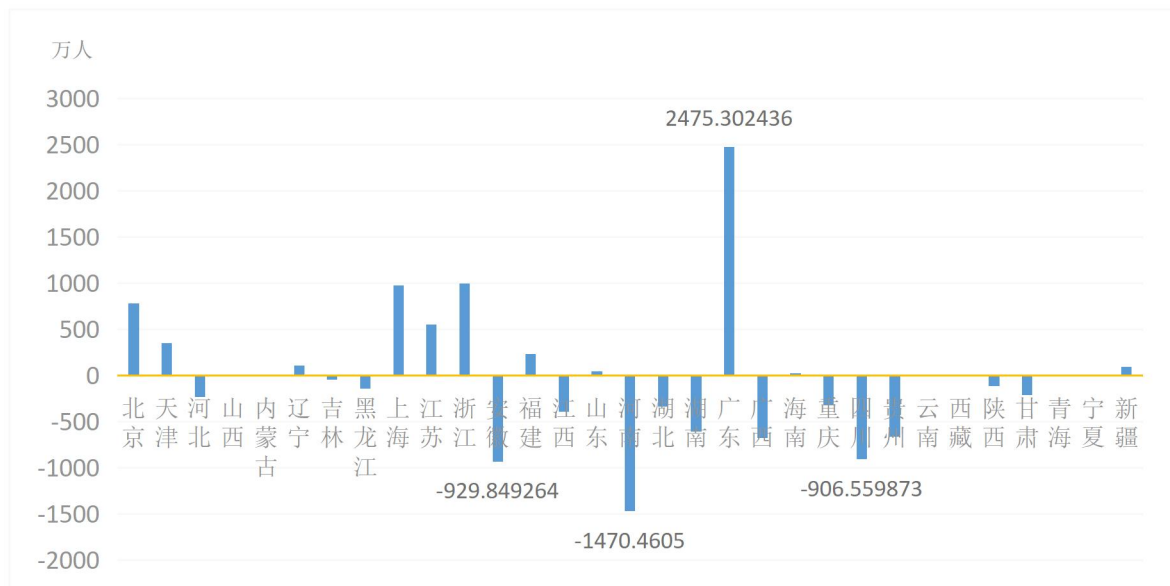


图 3.4 2009-2019 年的平均流动人口

¹ 数据来源：《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

图 3.4 为我国 2009-2019 年的平均流动人口情况。首先我们利用常住人口减去户籍人口的数值得到一个地区一年的人口流入和流出情况，然后将 2009-2019 年的人口流动情况进行加总并且除以 11 年算出这 11 年间的平均情况，依据平均结果与 0 相比的情况将 31 个省分为两部分，即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人口流入地为平均结果大于 0 的地区，相反人口流出地则为平均结果小于 0 的地区。另外有的省份变动情况相对较小无法清晰辨识，如内蒙古、吉林为人口流出地，山西、海南、云南、西藏、青海、宁夏为人口流入地，其余可以根据图 3.4 中橙色水平轴进行判断。

由图 3.4 可以看出广东省是人口流入地中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比排在第二的浙江还要多一倍多，可能是因为北上广深超一线城市中，广州市和深圳市都属于广东省管辖范围，而且深圳的户籍管理制度相较于北京和上海较为宽松，更能吸引人口。除此之外，人口流入最多的几个地区也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和上海也是人口流入第二多、第三多的地区，并且这三个地区的人口流入都在 700 万人以上。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山西和山东等地也属于人口流入地，但是人口流入数量却很小，显示出人口流入地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从人口流出地来看，其中河南省流出人口最多，比流出人口第二多的安徽省还要多近乎 60%，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河南人口基数大，二是河南为中原地区，第一产业占比高，较难解决如此庞大的人口就业，导致人口外流严重。除此之外，安徽、四川也是人口外流的主要省份，流出人口数分别为 929.85、906.56 万人，均在 900 万以上。另外，广西、贵州、湖南、江西等省份人口流出地流出人口也较多，通过和人口流入地对比可得知，人口流入地较为集中，大都集中在北上广和江浙等东部地区，而人口流出地则较为分散，大多数为中西部地区。

3.1.3 地方财政支出

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反映了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程度大小和范围多少，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可以从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这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如图 3.5 表示的是 2009-2019 年所有的支出总量情况，图 3.6 表示的是 2009-2019 年所有的支出相对量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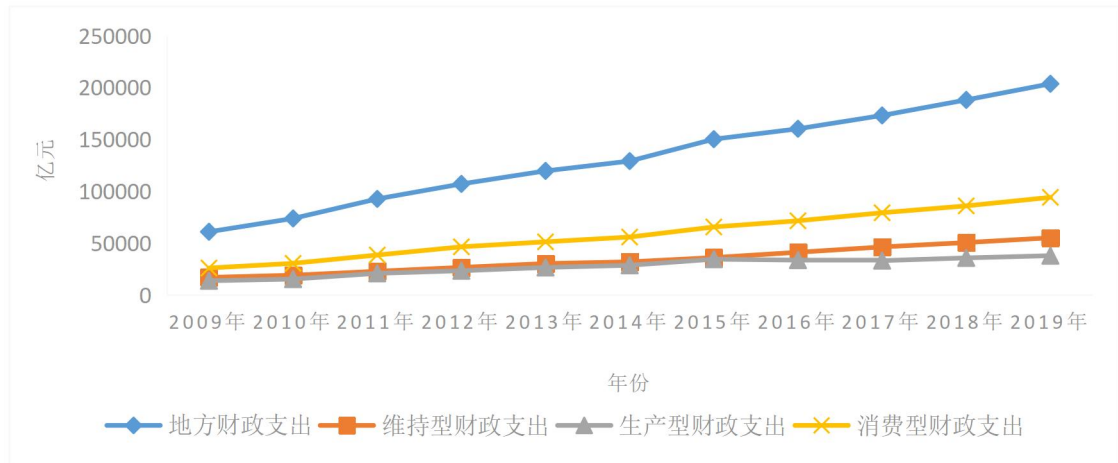


图 3.5 2009-2019 年地方财政支出及各类支出的总量情况

如图 3.5 所示，2009-2019 年地方财政支出及各类支出的总量都呈现不断增长趋势，这也符合财政支出增长模型的理论。其中，消费型财政支出大致呈现直线增长的上升趋势，增长速度相较于地方财政支出总量有所降低，但是仍高于维持型、生产型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维持型财政支出较为平稳，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生产型财政支出在 2016-2017 年呈现下降趋势，除此之外都在平稳增长。维持型、生产型财政支出规模在 2016 年之前保持着近乎一致的趋势，但是 2016-2019 年生产型财政支出的增速小于维持型财政支出，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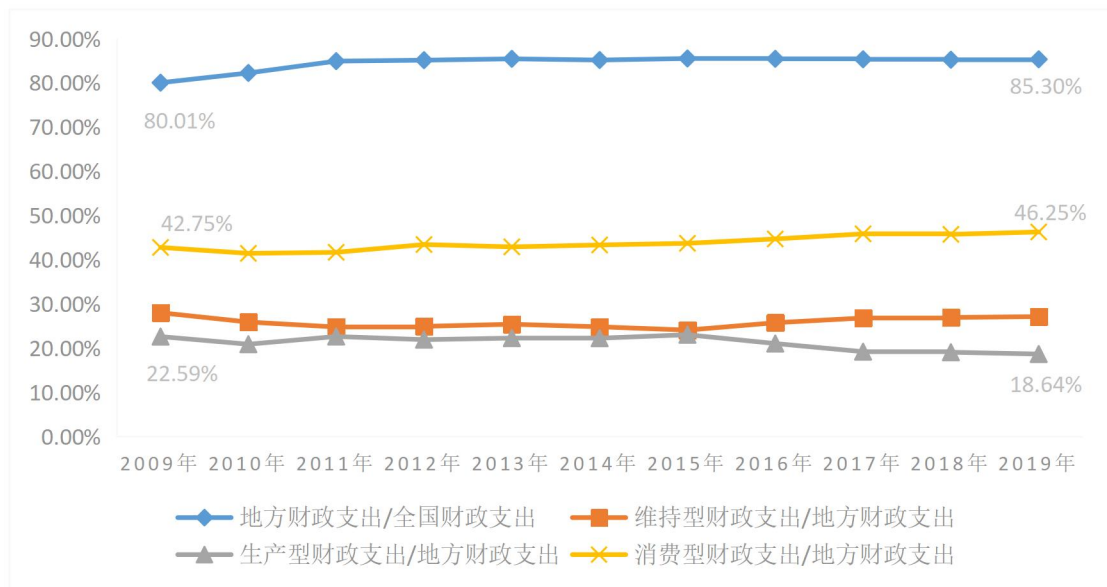


图 3.6 2009-2019 年地方财政支出及各类支出的占比情况

地方财政支出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政府行为的集中体现,其结构的合理程度也能够展示出政策倾向的合理程度。从图 3.6 可以看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都在 80%以上,从 2009 年的 80.01%增加到 2019 年的 85.30%,地方政府在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民生需求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中央政府发挥的作用相较于地方政府则较小。消费型财支出的比重从 2009 年 42.75%平稳提高到了 2019 年 46.25%,而另外两种支出结构的比重呈现下降状态,尤其是生产型支出的比重,由 2009 年的 22.59%波动下降到 2019 年的 18.64%。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消费型支出统计的科目较多,同时消费型支出内的大部分具有一定的刚性;另一方面,政府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可能会使得维持型、生产型财政支出的效率提高,降低其所占比重,从而使得消费型财政支出比重持续增长。

从图 3.5 和 3.6 可知,地方财政支出绝对值不断增加,消费型财政支出在绝对数值和占比上都大于维持型、生产型财政支出,支出结构整体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并不能表明支出结构的变化是随着人口的流动情况而变化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3.2 作用机理分析

3.2.1 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支出的作用机理分析

通常认为,地方政府更加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进行地方财政支出会更有效率,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群众,进而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但是我国属于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不同于其他经济分权和政治分权的财政分权体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首先,在政治集权下的中央政府能够足够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会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等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目标。然后中央政府通过事权下移让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利益主体的概念得到了强化,在完成了基本的社会责任指标之后,会有更大的积极性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但是事权在下放的过程中,财权并没有相应的下放,反而有上收的趋势,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差额由中央转移支付补充,中央转移支付一般具有专项性的特点,难以满足差额,因此通过大量举债来增加财政收入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被动选择。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

吸引企业进行投资，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发生地方政府竞争有限资源的现象。

另外，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是提拔官员的指标之一，政府官员出于理性人的角度考虑，也会由于不同的财政支出会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而进行财政支出的选取。同时政府官员具有任期限制，所以在经济激励和晋升机制的双重作用下，为了能够在任期内呈现出更大的效益，地方政府趋向将有限的财政支出多投向于短期具有经济效应的支出。消费型支出虽然影响可能较为深远，但是短期内效果并不明显，需要长期坚持作用下才能看到成效。所以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倾向于短期效果明显的生产型支出，就会导致消费型支出相对于生产型支出而言较难满足群众需求，这可能也是我国有些城市长期处于修路状态的原因之一。同时政府官员由中央任命，并不是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所以官员会对上级政府负责，容易疏忽当地群众的诉求，整体导致偏向于生产型支出。

地方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较大的积极性去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规模经济，完善投资环境，吸引企业投资，带动居民就业，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收入都会有所增加，进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教育、医疗方面的收入出于利民的考虑，大部分具有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等政策，能够带来的财政收入较少，所以从该角度也可得出地方政府偏向生产型支出。

综上所述，从缓解自身压力、获得政治晋升和经济利益这几方面都可以分析得出地方支出结构整体上会偏向于生产型支出。

3.2.2 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作用机理分析

人口流动主要包括劳动力的流动。对于人口流入地而言，人口流入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匹配；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人口流动为流入地提供了优秀的人才队伍，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实现人力资本正的外部效应，促进构建创新型城市。对于人口流出地而言，人口流出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人口流出能够增加流出人口的收入；通过在流入地工作和生活，能够转变思想观念，学到技术本领，随着沿海产业结构的外迁和政

策鼓励下的人口回流,吸引有技术的人才回流,推动人口流出地的经济发展。除过上述积极的经济意义以外,人口流动整体上会加重人口流入地的财政支出压力,造成人口流出地的资源浪费,接下来具体阐述人口流动对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

对于维持型支出来说,最典型的是治安管理。当人口的数量属于政府合理管理范围内,人口进行增长时,成本并不会有所变动;当大于合理范围时,人口的增加才会引起维持型财政支出相应地增加。政府的合理管理范围和当地的发展水平、政府管理能力等都有关系,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分析。一般来说,对于人口流入地而言,人口刚流入时,这一支出并不会发生变动,但是随着人口流入的数量增加到超过政府管理范围时,就会增加维持型支出的供给。人口流出地理论上并不会随着人口的流出减少维持型支出的供给,因为流出地流出前后的人口都在原来的合理范围内。

最典型的生产型支出是交通设施,人口流入地随着人口的流入,易于产生道路拥堵等城市病,对道路的扩建、维修等需求大幅增加,从而增加这方面的支出。人口流出地随着人口的流出,道路等相对来说较为畅通,使得部分资源处于闲置的状态,但是依然需要对道路等进行维修,会造成浪费。

消费型支出具有较强的属人特性。对于人口流入地来说,人口流入会增加对文化、教育、医疗、社保等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财政支出会随之增加。但是当地政府为了保障户籍人口获得服务,会利用户籍制度把外来人口排除在受益范围外,从而也可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但是消费型支出也具有正的外部性,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降低当地户籍人口的福利水平,发生挤占现象,造成户籍人口对流入人口的歧视,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

对于人口流出地而言,经受过良好教育的本地居民到了人口流入地之后,人口流入地并不会对人口流出地之前的教育支出进行补偿,这就意味着教育的正的外部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口流出地对教育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同时留在当地的多为孩子和老人,抚养负担较重,社会问题较为严重,需要增加社保、医疗等方面的支出。

3.2.3 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作用机理分析

地方政府为了能够在任期内呈现出更大的效益,满足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诉求,地方政府趋向将有限的财政支出多投向于短期具有经济效应的支出。财政分权下各地经济发展差距是引起人口流动的原因之一,虽然当前人口流动规模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绝对量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上,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必然会增加对公共交通、社会治安能力等的需求。近年来,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也成为趋势,长期居住的意愿增强,家里的老人流动到人口流入地,必然会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家里孩子流动到人口流入地会增加对文化、教育等的需求,同时流动人口的公平意识增强,努力争取自身的正当权益,这些都会增加地方财政支出。另外,地方政府进行财政支出时存在户籍限制,财政分权对户籍制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分析财政分权和人口流动共同作用下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如下图 3.7 所示,是本文的逻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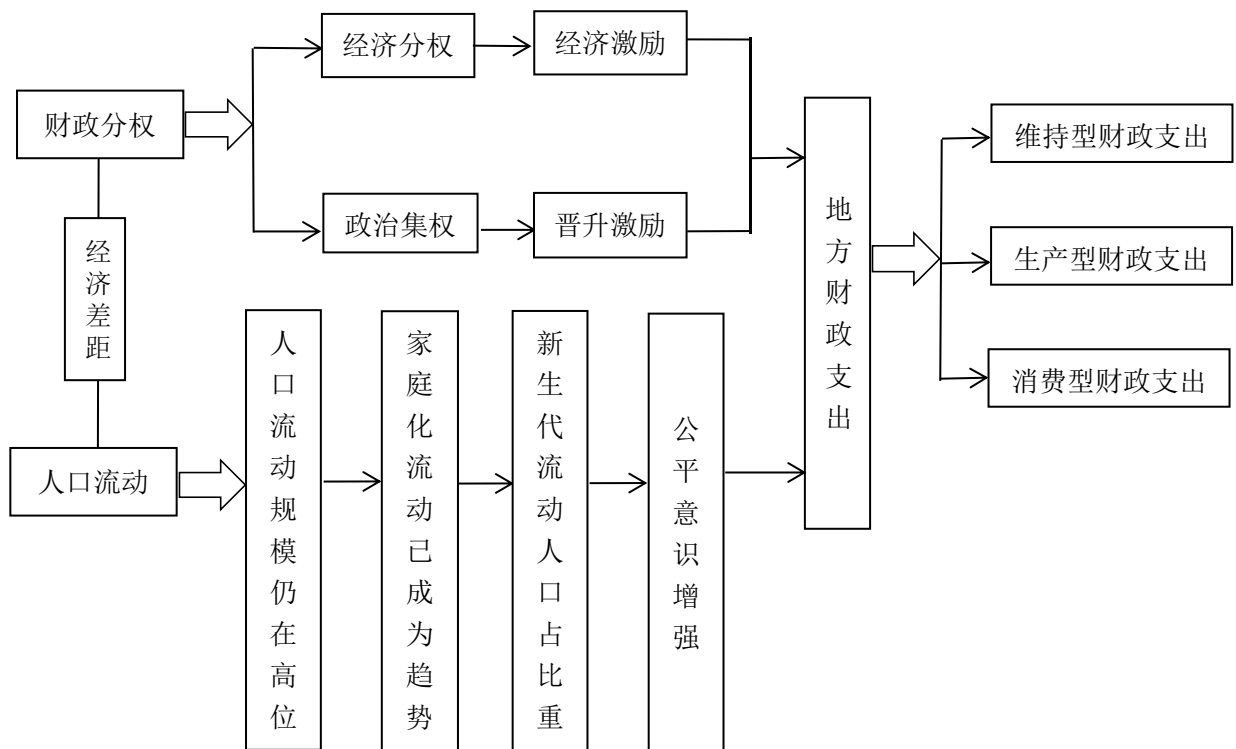


图3.7 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逻辑图

4 实证检验及分析

4.1 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和处理

4.1.1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地方财政支出，可以从其规模和结构两方面进行讨论，根据 2.1.3 可以得出，结构又分为三部分。表达形式主要可以从绝对值和相对值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绝对值包括地方财政支出的总量和结构支出的总量，相对值包括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人均结构支出、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和结构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出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作用，本文采用人均地方财政支出表示对地方财政支出均量的影响，采用人均维持型支出、人均生产型支出、人均消费型支出表示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均量的影响，用来对比对财政支出结构内部之间、总量和结构之间的不同影响。图 4.1 展示了我国 31 个省这十一年间的所有被解释变量大致都呈现出随时间而增长的趋势，均呈现出不同程度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也侧面证明了财政支出增长模型的理论。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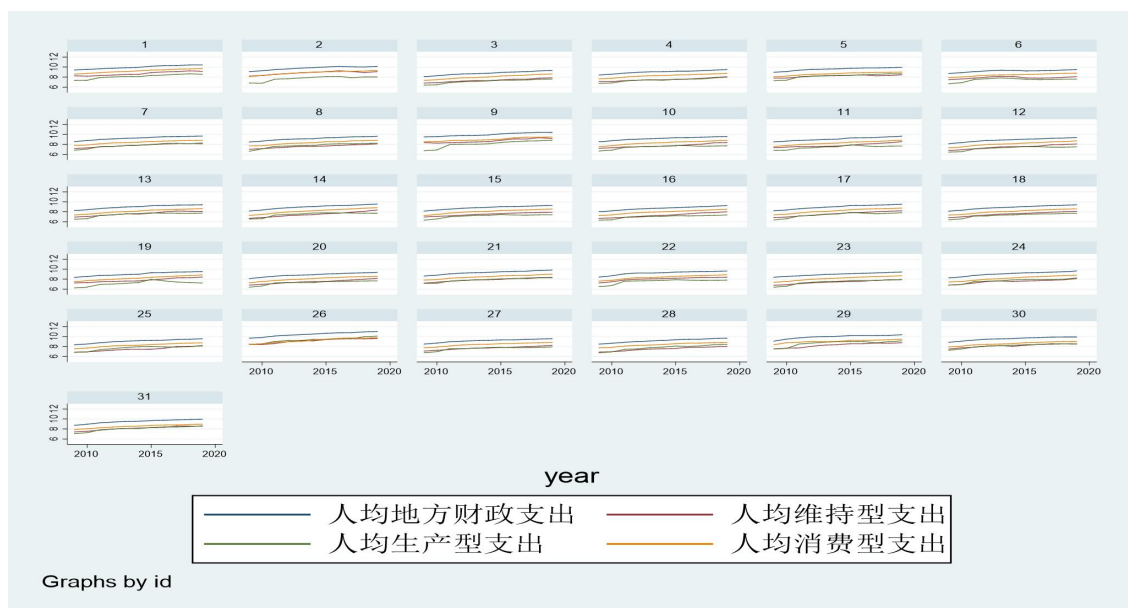


图 4.1 时间趋势图

¹ 图 4.1 中的 31 个省份是按照统计年鉴中北京-新疆的顺序进行排列。

2. 解释变量

财政分权。财政分权是一种制度因素，结合经济激励和晋升机制给予地方政府以激励，使地方政府多投入短期内效果明显的财政支出。财政分权一般分为两部分，包括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也有学者加入财政自主度组成了三部分。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等，所以使用财政支出分权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分析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同时在稳健性检验环节采取财政收入分权来替换财政支出分权，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另外，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财政支出分权也往往呈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本文借鉴刘欢(2018)，列出了具体公式如下：

$$\text{财政支出(收入)分权} = \frac{\text{各省人均本级财政支出(收入)}}{\text{各省人均本级财政支出(收入)} + \text{中央人均本级财政支出(收入)}} \quad (4-1)$$

财政支出分权反映出地方承担的事权责任，财政收入分权反映出地方获得的财权大小。其中，各省本级财政支出是指各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各省本级财政收入采用各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和收入可以在《中国财政年鉴》中找到，各省人均是除以各省的常住人口，中央人均是除以全国的常住人口。

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的表达形成也可以从绝对值和相对值两个角度分别进行考虑，本文参照相关文献和从本文研究的角度出发，使用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比值来表示人口流动。如果这一比值大于1，表示是人口流入地，比值越大表示人口流入的数量也越大；相反如果小于1，表示是为人口流出地，比值越小表示人口流出的数量就越大。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几个关联程度较高的控制变量，尽可能地涵盖对财政支出有影响的关键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是一个地区的重要经济指标，能够直接地反映出当地经济的发展状况，经济因素又是影响财政支出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公共服务需求越旺盛，地方财政支出相应也越多。本文以人口流动为核心解释变量，更加注重人均的情况，所以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更为贴切，而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更能直观地展示出一个地区内人们的生活水平。

(2)城镇化率(%)。一般来说,城镇化率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也就越好,吸纳的人口和企业也就越集中,越需要增加地方财政支出提供与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各种配套设施,所以引入该控制变量。

(3)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般认为影响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的有两个因素,一就是该控制变量,二是人口流动量,一个地区人口的增长必然会影响当地财政支出,又由于本文讨论的是人口流动的影响情况,所以需要控制住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因此选取该控制变量。

(4)第三产业占比(%)。第三产业能够反映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一个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反映出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情况越好,进而也会影响到财政支出。所以本文控制变量也引入第三产业占比,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现将本文所有变量的情况整理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变量的选取

变量类型	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	Fis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常住人口
	人均维持型支出	Mai	维持型财政支出/常住人口
	人均生产型支出	Pro	生产型财政支出/常住人口
	人均消费型支出	Con	消费型财政支出/常住人口
解释变量	财政支出分权	Fd ₁	各省人均本级财政支出/(各省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中央人均本级财政支出)
控制变量	人口流动	Pms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
	人均 GDP	Lgdp	人均 GDP 的对数
	城镇化率	Urb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人口自然增长率	Pop	出生率-死亡率
	第三产业占比	Ind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4.1.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 2019-2019 年间我国 31 个省的数据，所有数据都是通过查阅《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2020) 获取的，有的数据还进行了一定的运算过程。另外，还对控制变量人均 GDP 的数值取了对数，以防出现异方差性，影响数据的结果。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都整理在下表 4.2 中。由表 4.2 可知，财政支出分权的平均值为 0.856，而财政收入分权的平均值仅为 0.508，说明我国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地方政府需要负担许多支出责任却不能获得相应的收入，体现了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另外，城镇化率最大值达到了 94.2%，是天津市在 2019 年的数据，最小值只有 22.2%，是西藏自治区 2012 年的数据，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城市化水平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人口增长率最大值为 11.470‰，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4 年的数据，而最小值为负数，是-1.010‰，是黑龙江省 2019 年的数据，说明人口自然率全面层面也存在较大差异，也说明黑龙江人口负增长问题较为严峻。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最大值为 83.7%，是北京市 2019 年的数据，最小值为 32.3%，是河南省 2009 年的数据，这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层面存在一定差距，第三产业对各地的贡献率也有一定距离，也说明河南处于中原地区，承担着我国 1/10 的粮食供给，第一产业占比较重，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

表 4.2 描述性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Fis	341	9.252	0.542	8.027	11.012
Mai	341	7.855	0.590	6.682	9.608
Pro	341	7.677	0.644	6.257	10.093
Con	341	8.405	0.513	7.253	9.795
Fd ₁	341	0.856	0.046	0.732	0.961
Fd ₂	341	0.508	0.124	0.274	0.837
Pms	341	1.040	0.192	0.831	1.715
Lgdp	341	10.638	0.500	9.289	12.011
Urb	341	0.555	0.138	0.222	0.942
Pop	341	5.329	2.807	-1.010	11.470
Ind	341	0.479	0.091	0.323	0.837

4.2 模型介绍及设定

4.2.1 模型介绍

面板数据是指在一段时间里同一组个体的数据，它是指同时在截面上和时间上获得的数据结果，也被称为截面和时间的混合数据。与单一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比较，面板数据拥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包括的数据量庞大，能够提高检验的准确度；二是能够同时展示不同时间和截面上的详细情况，增强宏观上的分析能力。另外本文的所有实证过程都借助于 stata15 软件运行，通过整理 2009-2019 年间 31 个省的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下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作用，得出一些结论并且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4.2.2 模型设定

依据上文的模型介绍和本文的研究目的，可以看出面板模型符合本文研究的需要，所以构建以下面板模型的表达式：

$$Fis_{it} = \alpha_i + \beta_1 Fd_{1it} + \beta_2 Pms_{it} + \beta_3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2)$$

$$Mai_{it} = \alpha_i + \beta_1 Fd_{1it} + \beta_2 Pms_{it} + \beta_3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3)$$

$$Pro_{it} = \alpha_i + \beta_1 Fd_{1it} + \beta_2 Pms_{it} + \beta_3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4)$$

$$Con_{it} = \alpha_i + \beta_1 Fd_{1it} + \beta_2 Pms_{it} + \beta_3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5)$$

上述表达式中，Fis、Mai、Pro、Con 都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维持型财政支出、人均生产型财政支出和人均消费型财政支出， Fd_{1it} 表示财政支出分权， Pms_{it} 表示人口流动， X_{it} 是控制变量组。另外， i 的范围为 1-31，代表我国的 31 个省， t 的范围为 2019-2019，代表 2009-2019 年这 11 年， α_i 指除了模型中所用到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外的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整体作用， β_1 、 β_2 、 β_3 分别表示为财政支出分权、人口流动和控制变量组的估计系数， ε_{it} 是随机扰动项，它们内部之间是独立存在的。

4.3 实证检验

4.3.1 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为了验证数据的平稳性，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确保估计的有效性。避免出现使用非平稳数据进行回归，从而产生“伪回归”影响模型的准确性。单位根检验主要有六种方法，分别是 LLC、IPS、费雪式、Breitung、Hardi LM 和 HT，其中一般短面板使用 HT 检验，其余为长面板的检验方法。当截面数 n 大于 T 为短面板，截面数 n 小于 T 为长面板，由于本文 $n=31$ ， $T=11$ ， n 大于 T ，所以本文为短面板数据，采用 HT 检验，同时使用一级差分来确保统计量未出现偏差。HT 检验的原假设为“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从表 4.3 可以看出所有变量都在拒绝了原假设，由此可知所有变量都不存在单位根问题，数据较为平稳。另外，表 4.3 检验类型中 c 为常数， t 为趋势项， t 为 0 表示无趋势项， k 为 1 表示一阶滞后。

表 4.3 相关变量的 HT 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c, t, k)	统计值	Z 值	P 值	检验结果
Fis	(c, t, 1)	0.1679	-3.2287	0.0006	平稳
Mai	(c, t, 1)	0.0975	-4.3253	0.0000	平稳
Pro	(c, t, 1)	-0.0072	-5.9587	0.0000	平稳
Con	(c, t, 1)	-0.0187	-6.1377	0.0000	平稳
Fd ₁	(c, t, 1)	0.2497	-1.9528	0.0254	平稳
Fd ₂	(c, t, 1)	0.2494	-1.9583	0.0251	平稳
Pms	(c, 0, 1)	0.3679	-7.2593	0.0000	平稳
Lgdp	(c, 0, 1)	0.3830	-6.9541	0.0000	平稳
Urb	(c, 0, 1)	0.0695	-13.2863	0.0000	平稳
Pop	(c, t, 1)	-0.0922	-7.2830	0.0000	平稳
Ind	(c, 0, 1)	0.1266	-12.1332	0.0000	平稳

然后为了使得数据结果更加精确，还应该检查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联系，这就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本文进行 Kao 检验，同时选择其中的 DF 检验结果，如表 4.4 所示，所有 DF 统计量的 P 值都较小，均在 10% 以下，说明都拒绝原假设，显示所有的面板数据都存在长期均衡联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 4.4 协整检验

DF 检验	Fis	Mai	Pro	Con
统计值	-10.1146	-1.7921	-1.5294	-3.4187
P 值	0.0000	0.0366	0.0631	0.0003

4.3.2 基本回归分析

首先要利用 F 检验选择是采取混合回归还是固定回归, F 检验的原假设为“选择混合回归模型”;接着用 Hausman 检验进行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选取, 原假设为“选择随机效应模型”。通过运行, 发现本文所用的所有模型 F 检验都拒绝了原假设, 选择固定效应, 所以只列出 Hausman 值来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之间选取, 由表 4.5 可知, 人均消费型支出的 Hausman 值为负数, 接受原假设, 选择随机效应, 其余均选择固定效应。需要注意的是表 4.5-4.8 中实证结果的 F 统计值为回归结果中的 F 值, 而非 F 检验。

表 4.5 全国层面的实证结果

变量	Fis	Mai	Pro	Con
Fd _i	4.562*** (16.42)	2.680*** (5.62)	9.759*** (12.25)	5.292*** (16.85)
Pms	0.556*** (3.59)	0.152 (0.57)	1.605*** (3.61)	-1.105*** (-10.96)
Lgdp	0.719*** (23.98)	0.849*** (16.51)	0.716*** (8.33)	0.767*** (23.37)
Urb	0.432** (2.14)	-0.044 (-0.13)	-0.311 (-0.54)	-0.768*** (-4.03)
Pop	-0.010*** (-2.67)	0.002 (0.38)	-0.043*** (-3.85)	0.002 (0.31)
Ind	1.576*** (12.09)	1.920*** (8.58)	1.319*** (3.53)	2.720*** (17.27)
_cons	-3.820*** (-18.61)	-4.542*** (-12.89)	-10.200*** (-17.33)	-4.020*** (-14.40)
R ² (Within)	0.9765	0.9351	0.8696	0.9601
F 统计值	2104.36	729.52	337.83	-
Wald 值	-	-	-	5373.13
Hausman 值	184.01	71.53	117.70	-32.66
模型选择	fe	fe	fe	re
Obs	341			

注: 1. 括号内是 t 值。 2. *** p<1%, ** p<5%, * p<10%。 3. 下同。

表 4.5 中模型的总体拟合优度值分别为 0.9765、0.9351、0.8696、0.9601，整体都较好，说明这四个模型中的所有被解释变量都可以被各自的解释变量所解释。固定效应模型的 F 统计值也都较高，分别为 2104.36、729.52、337.83，也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固定效应模型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显著性。

本文最关心的是财政支出分权和人口流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如表 4.5 所示，财政支出分权对所有被解释变量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关系。具体来说，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财政支出分权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就增加 4.562 个单位，人均维持型财政支出增加 2.680 个单位，人均生产型财政支出增加 9.759 个单位，人均消费型财政支出增加 5.292 个单位。对比可得，地方政府重视生产型支出，其次是消费型支出，维持型支出则最少，这可能是因为生产型支出能够在短期内带来经济收益，也易于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也能获得绩效从而实现晋升。而消费型支出和人们生活密不可分，且涵盖范围广，消费型支出相对生产型支出显然是不足够的，而维持型支出则相较于其余两种支出变动较小。

接下来看人口流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从整体上看，人口流动对所有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均小于财政支出分权的影响系数。如表 4.5 所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口流动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是 0.556，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口流动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增加 0.556 个单位。人口流动对人均维持型财政支出不显著，说明人均维持型财政支出和人口流动无显著关系，验证了维持型财政支出在政府的管辖范围内运作，人口在合理范围内一般不发生显著变化。人口流动对人均生产型财政支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为 1.605，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口流动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生产型财政支出增加 1.605 个单位，说明人口流入使得流入地的人口密度增大，形成集聚效应，增加流入地政府在交通等基础设施上面的支出，从而导致人均生产型财政支出增加；人口流动对人均消费型财政支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估计系数是 1.105，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口流动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消费型财政支出减少 1.105 个单位，说明人口流动大量涌入会降低当地人均消费型财政支出水平。消费型财政支出与人口关系最为紧密，这说明地方政府没有根据人口的实时变动

灵活调整消费型财政支出，同时也说明，户籍限制还没有全面放开，政府仍然按照户籍人口进行有区别的消耗型财政支出的供给，未把流动人口纳入管理范围，造成当地人均消耗型支出呈现降低的趋势，相对于生产型支出，消耗型支出也易于用户籍制度进行区分，这也是人均消耗型支出降低的一个原因。所以人口流动率整体上会增加人均财政支出，结构上却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控制变量人均 GDP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分别为 0.719、0.849、0.716、0.767，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均 GDP 每增长 1%，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增加 0.00719 个单位，人均维持型财政支出增加 0.00849 个单位，人均生产型财政支出增加 0.00716 个单位，人均消耗型财政支出增加 0.00767 个单位，对比可得人均 GDP 对人均维持型、消耗型支出多于人均生产型支出，说明人均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越重视社会治安等公共安全和与人们关系紧密的消耗型需求支出。

控制变量城镇化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为 0.432，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城镇化率每增加一单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每增加 0.432 个单位。城镇化率对人均维持型支出和人均生产型支出都不显著，对人均消耗型支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负相关关系，估计系数是 -0.768，说明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城镇化率每增加一单位，人均消费支出减少 0.768 个单位。城镇化最重要的是指人的城镇化，要大致实现人均服务的均等化。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人口会增加，对财政支出需求增加，一定程度上需要增加财政支出。但是城镇人口并不等同于户籍人口，由于政府多按照户籍人口进行财政支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均消耗型支出，也反映出土地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速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快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控制变量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人均生产型财政支出在 1% 的显著下水平下呈现负相关关系，估计系数是 -0.010 和 -0.043，表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减少 0.010 个单位和人均生产型财政支出减少 0.0423 个单位。这说明地方政府没有很好地根据人口自然增加动态调整财政支出，使得当地居民需求也没有及时地得到满足。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人均维持型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也验证了维持型财政

支出在一定范围内运行,受人口变动影响不明显。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人均消费型支出的影响也不显著,但是估计系数为正值,说明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人均消费型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有正向影响。

控制变量第三产业占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分别为1.576、1.920、1.319、2.720,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第三产业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增加1.576个单位,人均维持型支出每增加1.920个单位,人均生产型支出每增加1.391个单位,人均消费型支出增加2.720个单位,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系数均大于人均GDP的影响系数,说明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要大于人均GDP。瓦格纳法则指出当国民的收入水平增加时,财政支出就会以更高的比例增加。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能够反映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占比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居民收入也就越高,财政支出增加越多,估计系数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第三产业占比每增加一单位,财政支出增加都超过一单位,也说明第三产业和人们实际收入水平的关系更为紧密。

4.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财政支出分权和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影响的稳健性,本文引入了财政收入分权,换掉了财政支出分权,然后再重复上面的步骤,具体的模型选取和回归结果如表4.6所示。根据表4.6的Hausman值可知,除了人均消费型支出选取随机效应,其余都选取固定效应。根据表4.6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收入分权、人口流动的估计系数和表4.5中财政支出分权、人口流动的估计系数的正负号方向一致,证明了原有变量对地方财政支出影响的回归结果很稳健。

表 4.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Fis	Mai	Pro	Con
Fd ₂	1.631*** (10.68)	1.684*** (7.85)	2.785*** (6.51)	0.694*** (3.90)
Pms	0.264 (1.46)	0.029 (0.11)	0.989* (1.96)	-0.569*** (-3.59)
Lgdp	0.819*** (24.54)	0.832*** (17.74)	1.005*** (10.75)	1.002*** (29.34)
Urb	0.384 (1.62)	-0.099 (-0.30)	-0.389 (-0.59)	-0.518** (-2.20)

续表 4.6

变量	Fis	Mai	Pro	Con
Pop	-0.013*** (-2.95)	-0.001 (-0.19)	-0.047*** (-3.72)	0.004 (0.71)
Ind	1.658*** (10.32)	2.292*** (10.16)	1.183*** (2.63)	2.252*** (12.05)
_cons	-1.503*** (-6.73)	-2.853*** (-9.10)	-5.560*** (-8.89)	-2.828*** (-10.46)
R ² (Within)	0.9677	0.9404	0.8290	0.9651
F 统计值	1519.88	799.48	245.64	-
Wald 值	-	-	-	6853.11
Hausman 值	62.12	23.64	49.12	-66.75
模型选择	fe	fe	fe	re
Obs			341	

4.4 分流入地流出地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情况,同时根据 3.1.2 的内容分析和图 3.4 的展示,将全国 31 个省分为 16 个人口流入地和 15 个人口流出地进行具体分析,并进行以下的实证分析。

4.4.1 人口流入地

根据全国层面的分析和表 4.7 中的 Hausman 值,可以得出除了人均维持型支出选择随机效应之外,其余都选取固定效应。

表 4.7 人口流入地的实证结果

变量	Fis	Mai	Pro	Con
Fd ₁	4.541*** (11.23)	4.983*** (6.70)	10.108*** (7.81)	2.519*** (5.22)
Pms	0.616*** (3.52)	-0.470* (-1.91)	1.739*** (3.11)	0.884*** (4.24)
Lgdp	0.827*** (24.26)	0.931*** (15.28)	0.815*** (7.47)	0.881*** (21.69)
Urb	0.352 (1.60)	-1.006*** (-2.89)	-0.273 (-0.39)	0.492* (1.87)
Pop	0.0002 (0.03)	0.00946 (1.00)	-0.032** (-2.24)	0.012** (2.34)

续表 4.7

变量	Fis	Mai	Pro	Con
Ind	1.247*** (8.01)	1.798*** (5.92)	1.190** (2.39)	1.741*** (9.38)
_cons	-5.039*** (-19.02)	-6.189*** (-10.94)	-12.106*** (-14.28)	-5.455*** (-17.27)
R ² (Within)	0.9776	0.9041	0.8568	0.9714
F 统计值	1118.25	-	153.58	870.61
Wald 值	-	1328.79	-	-
Hausman 值	691.04	-113.64	79.37	133.84
模型选择	fe	re	fe	fe
Obs			176	

同全国层面一样，人口流入地模型的总体拟合优度都较高，固定效应模型下的 F 统计值也很高，也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即人口流入地固定效应模型的显著性都较高。

如表 4.7 所示，财政支出分权对所有的被解释变量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具体来说，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财政支出分权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就增加 4.541 个单位，人均维持型财政支出增加 4.983 个单位，人均生产型财政支出增加 10.108 个单位，人均消费型财政支出增加 2.519 个单位。这说明同全国层面一样，人口流入地整体上随着财政支出分权增加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生产型支出增加的比例明显高于人均消费型支出，结构上相对不合理，整体上呈现资源不匹配。

同全国层面一样，人口流动对所有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均小于财政支出分权的影响系数。具体分析，人口流动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为 0.616，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口流动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增加 0.616 个单位。对人均维持型支出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呈现负相关，说明人口流入地随着人口流入人均维持型支出减少，可能是因为随着人口流入，人口流入地这一支出的效率提高；更有可能是因为人口的数量超出了合理管理范围，维持型支出也没有随着增长，发生了挤占现象。对人均生产型、消费型支出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分别为 1.739、0.884，说明人口流入地随着人口流入会增加人均生产型、

消费型支出,说明人口流入地相对于全国层面更加关注流入人口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按照流入人口需求增加相应财政支出,进而更加吸引人口流入,但是对人均消费型支出的影响也明显小于对人均生产型支出的影响,需要加以重视,做出改变。

控制变量人均 GDP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分别为 0.827、0.931、0.815、0.881,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均 GDP 每增长 1%,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增加 0.00827 个单位,人均维持型支出增加 0.00931 个单位,人均生产型支出增加 0.00815 个单位,人均消费型支出增加 0.00881 个单位,同样对比可得人均 GDP 对人均维持型、消费型支出多于人均生产型支出。但是人口流入地的估计系数均比全国层面要高,说明人口流入地人均 GDP 对所有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要大于全国水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影响越显著。

控制变量城镇化率中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人均维持型支出呈现负相关关系,估计系数为-1.006,说明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维持型支出减少 1.006,这有可能是因为人口流入地经济运行效率较高,随着城镇化的提高,城镇人口增加,人均维持型支出反而呈现了下降趋势;更有可能是人口流动分析部分所指的挤占现象。城镇化率还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人均消费型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也说明人口流入地比全国层面更加重视与人口关系更加紧密的消费型财政支出。

控制变量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人均维持型财政支出没有呈现显著性关系,对人均生产型、消费型支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不同的相关关系,估计系数分别为-0.032 和 0.012,表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生产型支出减少 0.032 个单位和人均消费型支出增加 0.012 个单位,这说明人口流入地消费型支出很好地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适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生产型财政支出,导致人均生产型支出减少。

控制变量第三产业占比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分别为 1.247、1.798、1.190、1.741,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第三产业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增加 1.247 个单位,人均维持型支出每增加 1.798 个单位,人均生产型支出每增加 1.190 个单位,人均消费型支出增加 1.741 个单位,可以看出同全国层面一样,人口流入地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系

数也均大于人均 GDP 的影响系数, 同样人口流入地第三产业占比也验证了瓦格纳法则。

4.4.2 人口流出地

根据全国层面的分析和表 4.8 中的 Hausman 值可知, 人口流出地中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人均消费型支出采取固定效应, 其余两种支出采取随机效应。

表 4.8 人口流出地的实证结果

变量	Fis	Mai	Pro	Con
Fd ₁	4.814*** (16.29)	4.313*** (11.54)	10.817*** (15.68)	3.797*** (10.43)
Pms	-0.224 (-0.80)	-0.506* (-1.76)	-1.462*** (-2.82)	-0.368 (-1.06)
Lgdp	0.378*** (7.81)	0.488*** (9.95)	0.333*** (3.85)	0.469*** (7.87)
Urb	2.876*** (7.38)	0.957*** (2.79)	0.396 (0.73)	3.020*** (6.29)
Pop	-0.019*** (-3.52)	0.008 (1.12)	0.002 (0.17)	0.002 (0.26)
Ind	0.773*** (3.95)	2.677*** (12.01)	1.517*** (3.75)	1.133*** (4.70)
_cons	-0.427 (-1.28)	-2.335*** (-4.98)	-4.535*** (-5.05)	-1.540*** (-3.75)
R ² (Within)	0.9901	0.9712	0.8985	0.9870
F 统计值	2393.79	-	-	1820.95
Wald 值	-	4961.79	1022.11	-
Hausman 值	238.24	-1.52	-11.97	150.25
模型选择	fe	re	re	fe
Obs			165	

同全国层面一样, 人口流出地的总体拟合优度都较好, 固定效应模型的 F 统计值也很高, 也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即人口流出地固定效应模型的显著性都较高。

如表 4.8 所示, 财政支出分权对所有的被解释变量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具体来说,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财政支出分权每增加一个单位,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增加 4.814 个单位, 人均维持型财政支出增加 4.313

个单位，人均生产型财政支出增加 10.817 个单位，人均消费型财政支出增加 3.797 个单位。这说明同全国层面一样，人口流出地整体上随着财政支出分权增加财政支出，人均生产型支出增加的比例明显高于人均消费型支出，结构上相对不合理，整体上呈现资源不匹配。

同全国层面一样，人口流动对所有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均小于财政支出分权的影响系数。具体分析，人口流出地人口流动对大多数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性关系，但是都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尤其对人均生产型支出最为显著，相关系数达到为-1.462，说明人口流出地人口流动与人均生产型支出呈负相关关系，即人口流入值(人口流出值)越高，人均生产型支出越小(越大)，说明随着人口流出，人均生产型支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同理可得，随着人口流出，人均维持型支出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即人口流出地政府配置资源也是按照户籍人口来进行财政支出，形成了供给过多，造成了资源相对浪费的现象。

控制变量人均 GDP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分别为 0.378、0.488、0.333、0.469，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均 GDP 每增长 1%，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增加 0.00378 个单位，人均维持型支出增加 0.00488 个单位，人均生产型支出增加 0.00333 个单位，人均消费型支出增加 0.00469 个单位，同样对比可得人均 GDP 对人均维持型、消费型支出多于人均生产型支出。但是人口流出地的系数均比全国层面要低，说明人口流出地人均 GDP 对所有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要低于全国水平，即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影响也相对较小。

控制变量城镇化率中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维持型支出和人均消费型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流出地政府相应地增加了财政支出，能够很好地和城镇人口进行匹配。另外，城镇化率对人均生产型支出没有显著性关系。

控制变量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019，表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财政支出减少 0.019，这说明人口流出地财政支出没有及时根据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进行调整。除此之外，对其他的被解释变量都呈现不显著的关系。

控制变量第三产业占比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分别为 0.773、2.677、1.157、1.133，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第三产业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增加 0.773 个单位，人均维持型支出增加 2.677 个单位，人均生产型支出增加 1.157 个单位，人均消费型支出增加 1.133 个单位，可以看出与全国层面和人口流入地情况相同，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系数也均大于人均 GDP 的影响系数。同时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估计系数为 0.733，小于 1，有可能是因为随着人口流出地的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对地方财政支出影响也较小，也能侧面验证瓦格纳法则。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第一，从整体上看，财政支出分权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人口流入地、人口流出地，都对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呈现出正的相关性关系。具体来说，比较三种层面，财政支出分权对于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作用，人口流出地的系数最大，为 4.814，人口流入地系数最小，为 4.541，说明人口流出地比人口流入地更有积极性增加财政支出；比较三种层面，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均生产型、消费型支出的影响，可以看出人均生产型支出的系数都显著大于人均消费型支出的系数，说明人均消费型支出相较于人均生产型支出不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应该完善制度，转变现有的政绩考核，引导地方政府关注与人们需求密切相关的消费型支出。

第二，地方政府没有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及时进行支出调整。具体表现在：在全国层面，人口流动对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生产型支出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人均维持型支出关系不显著，对人均消费型支出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消费型支出具有较强的属人特性，能够根据户籍制度将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区分开来。在人口流入地层面，人口流入除了对人均维持型支出不显著外，其余都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人口流出地层面，人口流出对人均维持型、人均生产型支出有正相关关系，其余不显著，说明当前人口流入地都积极根据人口流动进行支出调整，相较于人口流出地财政支出能够更好地与人口流动相匹配，要积极引导人口流出地进行实现资源供给的匹配。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流入地人均生产型支出系数依然显著大于人均消费型支出，依然存在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第三，财政支出规模相对合理，基本随着财政支出分权和人口流动进行正增长，财政支出结构相对不合理，都呈现出人均生产型支出大于人均消费型支出的局面。在控制变量中，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占比都和所有的被解释变量呈正相关关系，说明财政支出能够较好地与人均 GDP、第三产业占比进行匹配，且第三产业占比的系数均大于人均 GDP，说明地方财政支出可以很好地匹配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城镇化率和人口增长率相较于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占比对所有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就呈现出一定的区域特性，需要具体分析。

5.2 政策建议

5.2.1 明确央地责任，完善考核制度

第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实现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通过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近年来地方财政支出占比远大于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同时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保持在 50%，说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严重不匹配，地方政府承担着地方大部分支出责任，收入占比却和中央收入占比不分上下，很难更好地执行自身职责，这可能也是导致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所以要加大体制改革，给予地方政府与事权相适应的收入权利，制定合适的收入分成激励机制，适当提高共享税的地方财政所占比例，稳步确定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进行区分，应对这一情况也有学者提出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起流动人口需求的支出责任，以便更好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但是大多数学者则指出要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中央政府根据流入地和流出地实际情况制定长期、明确、具体的职责划分，规定地方政府相关的责任落实情况，避免互相推诿现象的产生，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完成自身职责。比如说，中央政府可以和流入人口最多的几个省份共同承担流入人口的一部分消费型支出，满足流入人口医疗和教育等最为迫切的需求，缓解流入地的财政负担，保障流入人口权益，也可以减轻流出地政府一部分支出压力。

第二，完善官员考核机制。改变单一的由上级部门认定的形式和传统的唯 GDP 机制，将教育、社保、环保等与人们紧密相关的消费型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中，把流动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的满意程度纳入政绩考核中，并占据相当一部分比重；同时也要奖惩分明，把官员考核的结果加以应用，将考核结果作为晋升的重要指标，从而才能从根本上转变官员的政绩观；也还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培训教育，强化政府官员的理想信念，提升责任意识；最后还要发挥群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作用，畅通渠道，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多措并举地完善官员的考核机制，形成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也可以避免当前流出地生产型支出过度增长现状。

第三，中央政府要进行政策帮扶和资源整合，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步伐，缓解人口流动现状下带来的部分压力。使得愿意留在户籍所在地的人们可以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从而在户籍所在地进行生产和生活，实现安居乐业，减少部分在户籍所在地找不到合适工作而进行流动的被动局面，一定程度上减缓人口流入地的压力和增加人口流出地的活力，使得地区间的发展更加均衡。

5.2.2 完善人口流动的制度机制

第一，完善居住证和积分落户制度。健全和完备居住证管理机制，根据各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处积极解决，逐步推动拥有居住证的人大致能够享受和户籍人口一样的权利；也要加强宣传引导，让大多数流动人口了解这一政策，并且及时详细解答流动人口所产生的问题；也要降低能够取得居住证的准入门槛，增加受益群体的范围，保障更多人的正当权益。还要推行积分落户制度，逐步地放松落户制度的严格管理，逐步试行户口制度可以按照经常居住地进行选择登记，按照常住人口的实际情况而非户籍人口进行资源的配置问题。逐步打破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弊端，推进一个地区的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可以享受大致均等的服务，实现资源与人的匹配，让流入人口可以更好融入当地，构建和谐社会。

第二，搭建管理流动人口的平台。借助大数据时代的便利性，实现流动人口的信息联网。由流动人口自主或工作单位统一进行真实填写有关情况，发生变动并及时调整。各地政府也要加强信息的审核和实地的考察工作，各部门联合管理和应用，要时刻关注流动人口规模和常住人口规模，根据人口流动的动态调整相应调整当地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根据各地常住人口的情况确定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额，发挥地方政府间横向转移的作用，并且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保障资金用到实处。

第三，完善现有条例，推进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现有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法律层级较高，要引导全国各地积极推广，对于已经制定实施的地区，要根据现存问题积极修改完善；对于还未制定的地区，要加强引导，在借鉴已实行地区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条例。另外也要积极探索相关法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实施，让流动人口的权利拥有一

定的法律保护。

5.2.3 维持支出规模正增长，引导支出结构合理

第一，维持财政支出规模正增长现状。鼓励各地区发展适宜的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人均 GDP 收入，继续根据第三产业和人均 GDP 的增长相应地增加财政支出规模。城镇化率中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财政支出都能较好地与城镇化率进行匹配，全国层面要加强消费型支出与城镇化率的匹配程度，真正实现人口的城镇化。全国层面和人口流出地要及时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情况进行财政支出的供给。

第二，引导支出结构合理。建设智慧型服务政府，建设一体化服务大厅和通过线上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方便群众办理的同时也能相应减少自身管理成本，以此降低维持型支出的成本。政府也要制定具体、长久的城市规划，减少基础设施重复修建或者久未完工等效率低的现象，加强基础设施运行年限和日常维护保养等工作。这样能够提高维持型支出和生产型支出的效率，从而相应地增加消费型财政支出的规模，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与与当地居民更为相关的方面。

第三，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财政支出。全国层面要引导支出的资源匹配。人口流入地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保持，并要进一步加强消费型支出的力度，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在当下人才引进，吸引人口的重要关头，为流动人口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创造宜居城市，有助于吸引人口的流入，增强地方竞争力。

尤其要关注流出地的情况。人口流出地要摒弃大力投资生产型支出的思路，根据自身所处位置进行考量。如果是人口流入地最密集的周边区域，可以相对投资基础设施进而吸引人口流入，缓解人口流入地的压力，如河北省；如果是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省份，就要减少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降低后续维护成本，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运行的实际成本，而要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当地人口最需要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中，切身提高当地人口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进而可以吸引本地外出人口的回流，如大多数中西部省份。

参考文献

- [1]Ashby N J. Economic Freedom and Migration Flows Between US States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7, 73(3): 677-697.
- [2]Bonin H, RaffelhUSchen B, Walliser, J. Can Immigration Alleviate The Demographic Burden? [J]. Finanzarchiv: Public Finance Analysis, 2000, 57(1): 1-21.
- [3]Borrow L. School Choice through Relocation:Evidence from the Washington [J]. D. C. Are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6(1): 155-189.
- [4]Bucovetsky S. Public Input Competitio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89): 1763-1787.
- [5]Carlsen F, Langset B, Ratts J, Et Al. Using Survey Data to Study Capitalization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9, 39(6): 688-695.
- [6]Cebula R, Nairreichert U, Coombs C. Gross In-Mig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U.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An Exploratory Empirical Analysis, 2008-2009 [J]. Mpra Paper, 2013, 262(18): 74-83.
- [7]Christian, Lessman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Disparity: Evidence from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J]. Dresden Discussion Paper in Economics, 2009.
- [8]Day K M.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Local Public Good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25(1): 123-144.
- [9]Faguet, Jean-Paul. Does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o Local Needs? Evidence from Bolivi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88): 867-893.
- [10]Kallandranis C, Karidis S.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the Consumer-Voter Sentiment on Tiebout-like Migration:The EU 27 Case [J]. Global Economy Journal, 2014, 14(1): 31-55.
- [11]Keen M, Marchand M. Fiscal Competition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7(66): 33-53.

- [12]Mauro P. Corrup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68, 69(2): 263-279.
- [13]Prud' homme R. On the Dangers of Decentralization [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4.
- [14]Qian Y, 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77): 265-284.
- [15]Taylor A M, Williamson J G. Convergence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J].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997, 1(1): 27-63.
- [16]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416-424.
- [17]Todaro M.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 138-148.
- [18]Zhuravskaya E V. 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 Fiscal Federalism,
Russian Styl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3): 337-368.
- [19]陈凯,肖鹏.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技术创新——基于 277 个地级市的空
间计量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 (2) :69-79.
- [20]成喜玲,唐繁. 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J]. 海南
金融, 2016(1) :12-16.
- [21]段哲哲,黄伟任,黄昊. 流动人口对县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影响研究——基于
2009-2014 年江苏省 44 个县市数据[J]. 西北人口, 2017(1) :19-27.
- [22]付文林. 人口流动、增量预算与地方公共品的拥挤效应[J]. 中国经济问
题, 2012(1) :41-53.
- [23]付文林. 人口流动的结构性障碍:基于公共支出竞争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
济, 2007, 30(12) :32-40.
- [24]傅勇,张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 管
理世界, 2007(3) :4-12+22.
- [25]傅勇.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 [J]. 经济研
究, 2010(8) :4-15+65.
- [26]甘行琼,刘大帅,胡朋飞. 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实证

- 研究[J]. 财贸经济, 2015(10):87-101.
- [27] 高倩, 徐颖, 张华锋. 河北省流动人口空间集聚影响因素研究[J]. 区域经济, 2018(6):135-136.
- [28] 何文举, 刘慧玲, 颜建军.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收入水平与城市人口迁移关系——以湖南省市域中心城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8(12): 50-59.
- [29] 侯燕飞, 陈仲常. 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9):11-19.
- [30] 黄裕洪. 财政分权、区域技术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J]. 财政科学, 2021(4):81-92.
- [31] 江依妮. 外来人口聚集地区公共服务支出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 人口与经济, 2013(5):56-62.
- [32] 雷小乔, 杜子芳. 省际人口迁移与人均财政负担间影响关系研究[J]. 调研世界, 2017(1):35-39.
- [33] 李光龙, 梅婷婷. 财政分权、节能环保支出与经济增长[J].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21(2):39-44+51.
- [34] 李强, 刘庆发. 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质量[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29-36.
- [35] 林毅夫, 董先安, 殷韦. 技术选择、技术扩散与经济收敛机[J]. 财经问题研究, 2004(6):3-10.
- [36] 刘冰玉, 刘馨月, 金兆怀. 财政分权、人口流动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8(5):121-127.
- [37] 刘德军. 人口变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以山东为例[J]. 公共财政研究, 2015(3):32-44.
- [38] 刘欢, 张晨. 财政分权和人口流动对地方软公共品供给的影响[J]. 城市问题, 2018(6):73-79.
- [39] 刘会娟, 胡志勇. 公共财政支出对城市人口流动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蒂伯特模型的猜想[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8(2):83-88.
- [40] 刘金凤, 魏后凯. 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J]. 经济管理, 2019(11):20-37.
- [41] 刘玉萍. 分权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D].

- 重庆:重庆大学, 2018.
- [42] 卢雪澜, 邹湘江, 杨胜慧. 居住证影响了流动人口的的城市认同感吗?——基于随机森林算法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4):189-200.
- [43] 马海涛. 财政理论与实践[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28-33.
- [44] 庞瑞芝, 袁胜超, 吕翠翠. 财政分权提高了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吗——来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准实验的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5):31-44.
- [45] 庞伟, 孙玉栋. 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的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1):118-125.
- [46] 裴育, 贾邵猛.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参考, 2020(7):49-60.
- [47] 平新乔, 白洁.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 财贸经济, 2006(2):49-56.
- [48] 乔宝云, 范剑勇, 冯兴元.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6):37-46+206.
- [49] 任志成, 巫强, 崔欣欣.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省级出口增长[J]. 财贸经济, 2015(7):59-69+108.
- [50] 沈坤荣, 付文林. 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15(1):31-39, 171-172.
- [51] 史桂芬, 李真. 人口流动助推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面板数据[J]. 华东经济管理, 2020(6):10-18.
- [52] 史梦昱. 地方政府竞争、人口流动对公共品供给影响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20(14):18-26+37.
- [53] 陶翔. 流动人口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D]. 南昌:江西财经大学, 2021.
- [54] 杨刚强, 李梦琴, 孟霞. 人口流动规模、财政分权与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研究——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检验[J]. 中国软科学, 2017(6):49-58.
- [55] 王桂新, 潘泽瀚, 陆燕秋.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基于 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5): 2-13+111.
- [56] 王佳. 人口流动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 [57] 王金营, 李庄园. 快速成长城市流动人口对财政支出规模影响研究——以宁波市为例[J]. 财政研究, 2015(12): 82-89.
- [58] 王庆, 刘莎莎. 从国家分配到国家治理: 新中国 70 年财政实践的驱动力与内在逻辑[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37(01): 78-88.
- [59] 王庆, 牛媛媛. 地方财政支出对流动人口的空间影响分析[J]. 铜陵学院学报, 2021(2): 16-20.
- [60] 王玮. 地方财政学(第二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45-155.
- [61] 夏怡然, 陆铭. 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10): 78-90.
- [62] 向祎.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对人口迁移的影响[D]. 北京: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8.
- [63] 项淼琴. 人口流动对地区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9(10): 209-210.
- [64] 谢国根, 张凌, 赵春艳.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于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实证研究[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6): 51-59.
- [65] 杨文杰. 适应中国人口流动的财政政策优化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 2011.
- [66] 姚枝仲, 周素芳. 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化[J]. 世界经济, 2003(4): 35-44.
- [67] 袁晓玲, 张宝山, 胡得佳. 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地区差异的影响分析——以陕西省为例[J]. 华东经济管理, 2009, 23(9): 27-31.
- [68] 张丽, 吕康银, 王文静. 地方财政支出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实证研究[J]. 税务与经济, 2011(4): 13-19.
- [69] 张月月. 流动人口对地方财政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长三角主要城市为例[D]. 南京: 南京财经大学, 2018.
- [70] 赵佳佳, 王建林. 我国跨区域人口迁移与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用脚

- 投票”视角下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J]. 商业研究, 2018(11):73-81.
- [71] 郑磊.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研究, 2008(1):28-40.
- [72] 郑峥. 人口流动对城镇化模式的影响[J]. 环渤海经济瞭望, 2020(11):27-29.
- [73] 皱波. 财政分权、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D]. 广州:暨南大学, 2020.
- [74] 朱洁, 苏雯锦. 人口流动对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J]. 东岳论丛, 2017(5):125-132.
- [75] 朱洁. 基于人口流动视角的地方财政平衡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 2017.
- [76] 宗晓华. 财政分权、人口外流与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投资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10(15):86-88.

后 记

时光飞逝，还清楚地记得备战考研那段奋斗时光，如今都已经执笔写硕士论文的最后篇章了，不免心生感慨。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些许挫折，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更多的是收获，收获了三年难忘的校园生活，收获了一些宝贵的知识，收获了可贵的友情，更收获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导师王庆教授在我们研一刚入学就开始带着我们开组会，找小论文的题目，在一遍遍推翻重来中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题目，然后开始着手学模型、看文献、动手写、一遍遍修改，然后投稿、退稿、再投稿、中稿、再一遍遍修改、发表，终于在去年春天等到了小论文的见刊。之后就带着我们开始讨论大论文，在小论文的基础上一遍遍寻找合适的角度开展大论文，然后准备开题，着手写，预答辩，修改，降重，外审，最后答辩，我的论文能够顺利完成每一步都有着老师的付出辛苦，非常感谢老师这一路以来的帮助。这三年非常幸运跟着老师学到了很多知识，不仅领悟到了学术的魅力，还学会脚踏实地，沉稳低调，勤奋务实。

感谢我的室友和同门的小伙伴、班里的同学们，感谢你们在我学习和生活中的帮助，让我一次次地感受到了温暖，希望我们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感谢我的父母给予了我宝贵的生命，并且在漫漫求学路上一直无条件地相信着我，支持着我，鼓励着我，让我能够一直按着自己的想法生活。希望自己早日稳定下来，扛过父母身上的担子，让父母也可以按着自己的想法生活。

最后也要感谢学院的每一位老师，三年的学习生活进一步完善了我的知识体系，对财政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些都离不开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也要感谢各位答辩老师给出的修改建议以及各位评审专家的辛苦付出！